

創造力與自由的追求

——語言學家喬姆斯基側寫

• 紐邁耶

(Frederick J. Newmeyer)

要我寫一篇喬姆斯基的小傳，就像要我為父母寫照一樣。我再也想不出有誰對我的影響能超過他們。而且，我並不是唯一受喬姆斯基教益的人，世界上沒有幾百最少也有幾十位語言學家同樣對他尊崇備至，同樣受他的深刻影響。簡單說，喬姆斯基發展了一種世界觀，它對我的激發遠遠超過他人；他又創立了一門有思想深度的學科，並領導它前進。由於在這學科的核心工作，我對喬姆斯基的才智和能力深深感到欽佩。

讓我先舉一項統計資料，然後再講個小故事，來說明他的才華。統計資料是他在美國學術刊物引用最多的學者之中，排行第八，也是唯一在世的一位（弗洛伊德排行第七，黑格爾第九，他排在兩人之間）。故事則要追溯到1968至1969年間，當時我在喬姆斯基的大本營，麻省理工學院求學。他上課時有一次隨口說現代經濟理論內容貧乏，「任何一個有頭腦的人」都可在兩星期之內把它弄清楚。這話傳到曾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亦是同校教授的薩繆遜(Paul Samuelson)耳中，他立即向喬姆斯基提出挑戰，要求在兩周之後和他舉行一場經濟學辯論，論題由薩繆遜當天挑選。喬姆斯基雖然從沒有正式學過經濟學，但不假思索就答應了。後來出席辯論會的人都同意，喬姆斯基不但和薩繆遜旗鼓相當，而且偶然還能逼使後者表現得對本行似乎掌握不透呢！

我們怎樣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喬姆斯基對語言學的貢獻呢？也許可以說，他對語言學理論到底是甚麼事物的理論提出了一個新概念。在受到當時充斥知識界的經驗主義規限的早期語言學家眼中，語言學的目的只不過是為文本中的語法元素建構一套簡明的分類系統而已。但他在1957年出版的基礎論著《句法結構》(*Syntactic Structures*)一書中，喬姆斯基重新界定語言學理論的目的為：嚴謹和正式地描述「可能的人類語言」特徵，即要盡可能準確地把可以在語言中出現的語法過程和那些不可能出現的區別開來。這種喬姆斯基稱為「普遍語法」的特性描述，明確界定了所有語言的運作範圍。他認為自然科學家的工作也相

喬姆斯基對語言學的貢獻，是他重新界定語言學理論的目的為嚴謹和正式地描述「可能的人類語言」特徵，這種被他稱為「普遍語法」的特性描述，明確界定了所有語言的運作範圍。

類似：物理學家是要描述所有可能物理過程的特徵：生物學家則描述所有可能生物過程的特性，等等。

說到這裏，可能有人會奇怪為甚麼即使在他的政治觀點廣為人知之前，喬姆斯基就已經在語言學界以外聲名鵲起：畢竟，對於非專家來說，語法理論的正確形式是索然無味的。原因是，從一開始喬姆斯基和他的合作者便令人注意到這理論的心理學和哲學意義。在1959年一篇評論斯堅納(B.F. Skinner)《言語行為》(*Verbal Behavior*)的文章中，喬姆斯基首次形容他自己的理論——生成語法為一個認知模式。喬姆斯基指出，言語是極其複雜的東西，但兒童學習語言卻又快得令人得咋舌。因此他認為兒童不可能像斯堅納和其他行為主義學者所說，生來像一張白紙。其實，他們必定是由於遺傳，才能夠以高度特定方式來獲得語言。簡而言之，語言學家所建構的語法實在原來就存在於說話者的腦袋裏。

喬姆斯基這篇書評被視為認知心理學的基礎文獻，即使在35年之後，仍然是對行為學派最重要的反駁。在他所有著作中，最令他聲名遠播於語言學界小圈子之外的，就是對斯堅納的這篇書評。

喬姆斯基亦經常探索生成語法的哲學意義。如上所述，《句法結構》挑戰了美國結構語言學的經驗主義基礎。到1965年出版《句法理論的若干問題》(*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時，喬姆斯基已把生成語法明確界定為「理性主義」理論，因為它假定有某種內在規律決定人所獲得知識的形式。喬姆斯基重新提出兩個在學術討論中已過氣的詞語——天賦觀念(*innate ideas*)和心智(*mind*)，以作為他理論概念的組成部份。

對喬姆斯基來說，「天賦觀念」就是那些與生俱來，並且對語言學習構成限制的語法性質。讓我舉個例子：在任何語言中，關係從句(*relative clause*)的主名詞(*head noun*)都不能指稱複合名詞詞組(*complex noun phrase*)之內的位置。因此，以下的英語句子是不合符語法的：

The man_i whom I don't believe the statement that Lisi saw (t_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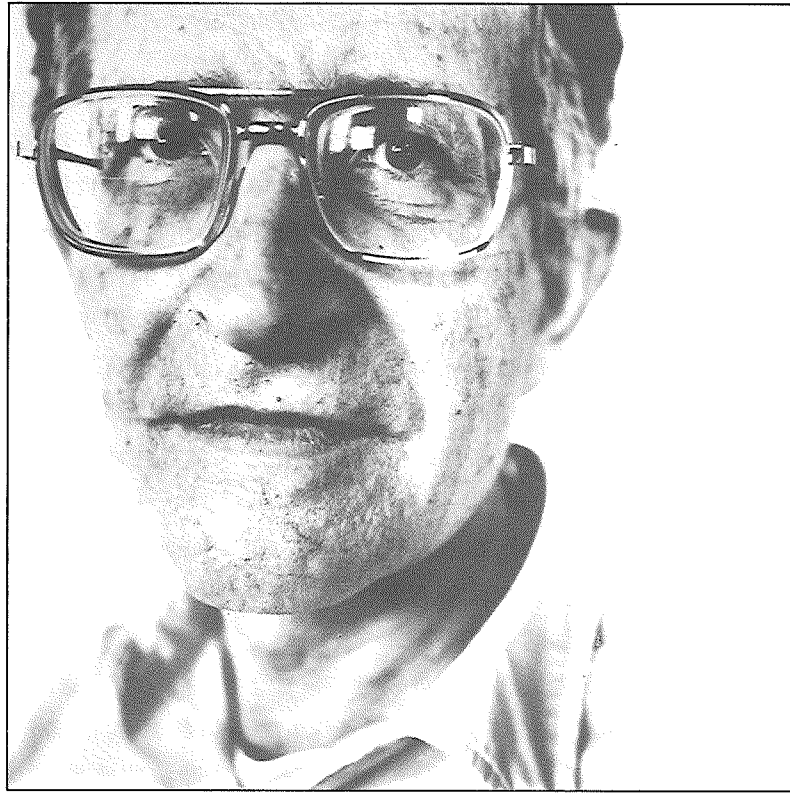
句中的主要名詞“the man”不可能是指複合名詞詞組“the statement that Lisi saw”裏面的動詞“saw”的賓語。同樣，王士元教授會發現類似的中文句子也不符合語法：

那個人_i 我不相信莉絲看見(t_i)這句話。

因為「那個人」不可能是「看見」的賓語。而事實上相類句子在世界任何一種語言都不符合語法。為甚麼會這麼？喬姆斯基的結論是，普遍語法中有一項他稱為「附接」(*subjacency*)的原則，這是與生俱來的，它使所有兒童都不會在他們的語言中應用像上述那樣的兩個句子。「附接」是一種「天賦觀念」。

喬姆斯基在1959年寫了一篇評論斯堅納《言語行為》的文章，被視為認知心理學的基礎文獻，亦是對行為學派最重要的反駁，由此令他聲名遠播於語言學界小圈子之外。

要找個最激進的學者兼知識份子，當非喬姆斯基教授莫屬。他是享譽三十年的語言學大師，也是美國外交政策和媒介意理控制最雄辯、最尖銳的指控人。



按照喬姆斯基說，「附接」是天賦的根據在於學習語言的兒童「缺乏刺激」：由於他們在學習過程中所得的相關資訊極為有限，所以決不可能那麼迅速地通過歸納方式來學習像「附接」這樣抽象的觀念。換言之，「附接」的內在性和普遍性可以從兒童並沒有足夠原始語言資料來自行推斷這種高度複雜和抽象的語法屬性來加以證明。

對喬姆斯基來說，「心智」是實際行為背後，包括先天和學習得來的原則，這些原則顯然不限於語言領域。比如，最近的研究顯示，視覺系統許多重要原理也是與生俱來的，只需外在經驗觸發就會運行。用喬姆斯基的說法，視覺理論也是理性理論，而視覺背後的結構(天賦觀念)則來自心智。

心智也許比語言包含更多認知能力，但喬姆斯基相信語言學研究最適合於揭露心智的本質。第一，語言是一種人類獨有的認知能力，即使研究低等動物的溝通方式對它也沒有幫助。而且，語言是人類另一獨有能力——理性思考的載體。最後，我們對語言和它的運作，知道得遠比其他認知方式多。畢竟，語法研究已超過兩千年，我們對語言結構的了解自然比只有一個世紀的視覺、記憶、概念組成等研究所得為多。

喬姆斯基也許是批評美國在1960至1970年代介入越戰最負盛名的一位學者。他的反戰立場，包括領導 RESIST 這一全國性抗徵召運動，比起他的學術貢獻更為人熟悉。從一開始，他就不光批評戰爭本身，也攻擊美國自由主義技術官僚政治，它以貌似進步的言論，來掩蓋戰爭背後的外交政策。他一再強

調知識份子有責任揭露官方的偽善，從西班牙內戰、中東、拉丁美洲以至一般人權問題，都成為他的關注點。

自然有人會問這些政治關懷和普遍語法、支配句法的天賦約束、以及生成語法等各方面有甚麼關係。喬姆斯基的語言學觀點和政治觀點到底有關連嗎？在《語言和責任》(*Language and Responsibility*)一書中，他認為只有很微弱的一點關係：

若說有關連，那也是很抽象的。我沒有任何特別分析方法，我在語言學上的任何專門知識，對社會和政治問題並沒有直接意義。我關於這些問題的所有著作，任何人都能寫出來。我的政治活動、著作和我研究語言結構並沒有甚麼直接關係，雖然，它們可能都多少源於某些涉及人類本性的共同承擔和態度。在我看來，和需要用相當抽象概念的研究相比，意識形態領域的分析是很直接了當的事。就意識形態分析(這我花了不少精力)而言，只要有點開放心態、普通智力和健全的懷疑精神就十分足夠了。

甚麼是「涉及人類本性的共同承擔和態度」？這可能指喬姆斯基相信，創造性的自我表現和自由決定一己生活和思想，都是人類的基本能力。顯然，這就是他政治觀點的核心。但創造性和自我表現的可能性，同樣是他語言心理學著述的主調。畢竟，他批評斯堅納文章的主要結論是，語言是獨立於刺激控制的：我們的確能創造性地運用語言。

喬姆斯基的政治活動，當然可以和他的語言研究分開。我可以舉出不止一位信奉極右政治思想，但對生成語法有重要貢獻的語言學家；而在他的政治盟友中，語言學理論和他迥然不同的，也大不乏人。但我想，他對回到基本原則的執着，對以創造性眼光看無論甚麼主題的執着，以及那不可捉摸的才華，應該是引領他在這兩個迥然不同領域走出自己特殊道路來的要素。我這說法大概是可以成立的。

喬姆斯基對語言學界的最大貢獻，除了他的思想以外，就是他曾經指導過的眾多學生。他們都已卓然自立，繼續為語言學奉獻心力。事實上，大家公認，從來沒有一位語言學家能像喬姆斯基一樣，教導出這麼多學生。雖然我蒙他指導僅有短短一年，但我對這門學問所作的些微貢獻，卻是在和他相處的短暫時間中受到啟發的。倘若沒有他，委實難以想像語言學界今日是何景象，我自己又是何景象：這可以說是我個人對他成就和影響的見證吧。

林立偉 譯

喬姆斯基的政治活動，當然可以和他的語言研究分開。但他對回到基本原則的執着、對以創造性眼光看無論甚麼主題的執着，以及那不可捉摸的才華，都是引領他在這兩個迥然不同領域走出自己特殊道路來的要素。

紐邁耶 (Frederick J. Newmeyer) 1969年於伊利諾大學獲頒博士學位，現任美國華盛頓大學(西雅圖)語言學系教授兼系主任，研究範圍以句法理論及語言學史為主。